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第二辑]

STUDIES
ON
ANCIENT
TOMB
ART Vol.2

主 编
巫 鸿
朱青生
郑 岩

Edit
Wu Hung
Lao Zhu
Zheng Yan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STUDIES
ON
ANCIENT
TOMB
ART Vol.2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第二辑〕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第二辑 / 巫鸿, 朱青生, 郑岩主编.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56-6463-1

I. ①古… II. ①巫… ②朱… ③郑… III. ①墓葬(考古)—美术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 K879.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6638 号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第二辑)

出品人: 李小山

主 编: 巫 鸿 朱青生 郑 岩

组 稿: 黄 啸

责任编辑: 王柳润

责任校对: 崔俊辉

装帧设计: 纪玉洁、马艳琴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100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463-1

定 价: 85.00 元

【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163588

前言

墓葬美术是从中国远古至近代历时最久、植根最深的一个礼仪美术传统，无论是时间的持续还是地域的伸延都在美术史中无出其右。它也是考古信息最为丰富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系统，其内涵包括了建筑、器物、绘画、雕塑、装饰、葬具、铭刻书法以及对死者身体的处理。在大量考古材料的支持下，对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的研究在近年内得到蓬勃开展，在宏观和个案的分析上都作出了不少成绩，同时也出现了对研究和解释方法的强烈兴趣。

这本论文集是2011年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召开的“第二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个成果。这次会议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与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三家主办，由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与湖南美术出版社协办。作为一系列“双年会议”中的第二场，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中外学者建构一个学术平台，围绕着“墓葬美术”这一主题进行持续的交流和讨论。出于这个目的，会议采取了对不同学术传统兼容并包的态度，既鼓励对考古个案的缜密研究和对历史源流的宏观思考，也提倡对研究和解释方法的认真探讨。对“墓葬美术”的概念也做了广义的界定，不仅包括墓葬出土的艺术品，而且涵盖了墓葬的整体设计、墓葬中不同视觉和物质形式的配置、墓葬所反映的礼仪、宗教和文化因素以及墓葬的发现和研究所。

聚焦于“墓葬美术”这一概念，这个会议和出版计划促使我们反思美术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发掘品与墓葬本身的脱节。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古代墓葬的发现和研究所包括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史、科学史及美术史等在内的学科发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些领域中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中，古代墓葬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激动人心、常常不为前人所知的艺术品，使美术史家得以不断丰富甚至重写个别艺术形式的历史——诸如青铜、玉器、绘画、雕刻、陶器和书法等。但是古代墓葬的这种贡献是以拆散其自身为代价的。这是因为当墓葬被离析为以媒质为导向的分类、研究和展览材料时，其整体性就被消除了。而当为黄泉世界专门制作的艺术品被抽取和孤立，与非墓葬艺术品掺杂在一起去构造一部宏观美术史，它们的原始礼仪意

义就丧失了，也不再激发我们对其特殊的设计和制作进行思考。

近年中出现的一些趋势已经对这一传统学术方向提出了挑战。这些趋势包括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更趋频繁与深入的互动和磨合；一些美术史学者开始把墓葬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或是作为解释出土艺术品的原境；新型博物馆中的展示越来越注重艺术品和考古环境的结合；坐落在墓葬原址的“古墓博物馆”更直接地保存了原始墓葬的建筑空间。通过把“墓葬美术”设定为这个会议系列及其出版物的基础概念和框架，我们希望这个交流平台能够推动这一潮流，使美术史研究者更加注意到墓葬美术的自身规律和历史进程，在这个基础上进而考虑它和其他美术传统的相互关系，同时探索研究墓葬美术的特定而有效的方法。通过开放式的讨论和自由交换意见，不断发掘这一艺术传统的丰富内涵和意义，也为世界美术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巫鸿

- 001 苏芳淑 / Jenny So
 古人存古——玉琮在古代墓葬中的诸意义
Antiques Preserved: Meanings of the Jade Cong in Ancient Tombs
- 019 来国龙 / Guolong Lai
 逝者的再现，无形的参列——战国秦汉墓葬艺术中人像观念的转变
The Presence of the Invisib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Human Figur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and Qin-Han Transition
- 055 Jessica Rawson / 杰西卡·罗森
 异域魅惑——汉帝国及其北方邻国
The Han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rs: The Fascination of the Exotic
- 073 施杰 / Shi Jie
 交通幽明——西汉诸侯王墓中的祭祀空间
Mediating between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The Sacrificial Space in Western Han Princely Tombs
- 095 Lukas Nickel / 倪克鲁
 砖叠苍穹——新莽墓葬建筑与绘画中的宇宙象征
Brick-Built Heavens: Cosmic Symbolism in Mortuary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 at the Time of Wang Mang (9–23 CE)
- 107 缪哲 / Miao Zhe
 重访楼阁
Revisiting the Pavilion
- 149 郑岩 / Zheng Yan
 弯曲的柱子——陕北东汉画像石的一个细节
The Curving Pillar —— A Detail of Eastern Han Dynasty Stone Reliefs in Northern Shaanxi

- 169 邵韵霏 / Yunfei Shao
双重视角下的复合意涵——朱然墓宫阙宴乐图漆案研究
Complex Meanings From Two Perspectives: A Study of a Painted Lacquer Table with Palace Banquet Scenes Unearthed from Zhu Ran's Tomb
- 191 林圣智 / Lin Sheng-chih
北魏平城时期的葬具
Mortuary Furniture in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215 Sascha Prieue / 裴严华
相互联结的聚落——北齐、北周与隋朝时期中国中北部地区的粟特人及其下葬方式
Networked Communities: Sogdians and their Burials in North-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Qi, Northern Zhou and Sui Periods
- 233 徐涛 / Xu Tao 师小群 / Shi Xiaoqun
石椁线刻与粉本的形成方式——兼论唐陵墓壁画图像粉本的来源
On Line-Engravings on Tang Sarcophagi and the Formation of Copybooks, With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opybooks Used in Painting Murals in Tang Mausoleums
- 253 百桥明穗 / Donohashi Akio
日本古坟壁画中的四神与十二支像——以高松冢、龟虎古坟为中心
Images of the Four Deities and the Twelve Zodiac Symbols in the Murals of Ancient Japanese Tombs: Focusing on the Takamatsu and Kitora Tombs
- 271 范淑英 / Fan Shuying
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
"Antique Mirrors" from Sui and Tang Tombs along with a discussion of Archaism in the Decoration and Inscriptions on Sui and Tang Bronze Mirrors
- 303 巫鸿 / Wu Hung
宝山辽墓三题
Three Aspects of the Liao Tombs at Baoshan

- 319 李清泉 / Li Qingquan
“一堂家庆”的新意象——宋金时期的墓主夫妇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
New Meanings of the “Family Assembly” Ceremony — Images of the Tomb Occupant Couple during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and Changes in Burial Practice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339 王玉冬 / Wang Yudong
蒙元时期墓室的“装饰化”趋势与中国古代壁画的衰落
The Tendency toward Ornamentation in Yuan Tombs and the Decline of Chinese Tomb Murals
- 359 姚进庄 / Josh Yiu
明清两代陵墓的石供桌
The Stone Altar in Ming and Qing Mausoleums
- 377 朱青生 / LaoZhu
汉画作为“图”的八种意义
Eight Meanings of Hanhua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 as “Images”

古人存古

——玉琮在古代墓葬中的诸意义

苏芳淑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 [1] 以玉器为研究目标者, 见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5), 22-27; 高志祜:《论魏国墓中之商代玉器及其他》, 邓聪编:《东亚玉器》II,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年, 页30-46。
- [2] 以青铜礼器为研究目标者, 见 Jessica Rawson. "Novelties in An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故宫学术季刊》, 22/1 (2004), 1-34;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A, 2006), 302-306; Jenny F. So, "Antiques in Antiquity: Early Chinese Looks at the Past,"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ugust 2008, 373-406;《古人拟古: 近年西方学者看东周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论谈录》第一辑, 紫禁城出版社, 2010年, 页351-359。
- [3] Jenny F. So 见注2。
- [4] 见 Jessica Rawson, 注1; 孙秉君、蔡庆良著:《芮国金玉选粹》, 三秦出版社, 2007年, 图1; 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重庆出版社, 2000年, 图 T25-28。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彩版15: 1, 16: 1; 图版91-94, 100: 2, 101: 1, 149。张长寿:《西周玉器的改制现象》, 邓聪编:《东亚玉器》II, 见同注1, 页213-216。
- [6] Jenny F. So: "Exploring Ancient Sichuan's Cultural Contacts: Evidence from Jade and Stone," *New Frontiers in Global Archaeology: Defining China's Ancient Traditions*, Thomas Lawton,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elebrating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28-20 May 2004 (New York: The AMS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08), 297-320。

古物或古董——尤其是古玉——在中国后世墓葬中之出现, 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 这是近年来考古界才开始关注到的新现象, 但在已发表的研究中, 一般都点到这即止, 并没有太深入的探讨。^[1] 相对地, 反而有较多专文讨论西周晚、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礼器复古风, 指出在—青铜礼器的复古过程中, 除了不同器类在不同地域受到特别标榜和重视外, 当时的政治环境还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反映不同地域对不同古代礼仪复兴的观感, 另一方面指出诸侯们利用传统礼制来凸显其远古世系和贵族身份。^[2] 笔者在这方面亦有研究, 文章结语里还指出:“玉器似乎没有显示如铜器般有意识的复古风气。”^[3] 故在此尝试以玉器为重点, 用同样方法探索古玉器在后期墓葬中出现, 及后人以之为模仿对象的诸原因。

一般而言, 墓葬中出土过三类“古玉”:

- 1) 后世保存前代之古物, 如安阳妇好墓、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墓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以及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战国六朝玉饰等;^[4]
- 2) 旧物新改, 古为今用, 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由宽边镯改造之玉玦、玉鱼形璜, 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用战国晚期玉璧残片镶嵌的鎏金铜玉枕等;^[5]
- 3) 后人仿古的新作, 如陕西长安张家坡 M170 墓出土刻有流行于西周铜器上鸟纹的玉琮, 山西太原金胜村战国赵卿墓 (M251) 的浅浮雕谷纹玉琮等 (见下文)。

青铜礼器一般体型重大, 不容易搬移。相反地, 玉器则轻巧易携带, 又因其往往蕴含了珍贵的个人意义和特别思想内涵, 是人们悲欢离合、世代相传的信物, 即使迁移逃难也必定随身携带, 因而在无文献记录情况下, 亦能透见人们迁徙、交往和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情境。^[6] 有鉴于此, 古玉器或在后世墓葬, 或远在他乡出现, 甚至已残破的旧玉仍被改造以示它在当时的宝贵价值, 这些情况都可以想象和理解。虽然因此或可解读第三类仿古玉器产生的“机缘”(opportunity), 但对古玉器的历代保存或仿造的“动机”(motive), 还未有充分解释。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 一件玉器之所以能被选择为保存对象, 以至世代相传, 或用在祭祀活动, 最终入墓陪葬, 是否因它是拥有者民族身份的标志?

[7] 杨建芳：《中国古玉器研究论文集》上册，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页7-10、39-40。

苏芳淑：《史前玉镯而观》，《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2011)论文集（待版）。

或因它是某种宗教信仰神秘力量的载体？或因它只不过是应随意舍弃的贵重物料？

本文从史前诸多类型玉器之中选取玉琮为个案研究，探讨后世墓葬出现古玉和古玉仿制品的问题，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诸玉器中最具地域性的、自创的、标志性独一无二的“内圆外方”形玉器。关于玉琮的产生，迄今尚未找到雏形，学界认为其或源于环形玉腕饰，经四角琢出精细的人兽组合图案后，而演变成其“内圆外方”的奇特形制。当它从一或二节的“琮”形腕饰发展到多节高的“琮”形礼器过程中，并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东南地区良渚范围内普遍作为陪葬品时，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已具备自身独特的礼仪和信仰意义了（图1-1、1-2、1-3）。^[7]



图 1-1：江苏武进寺墩 M4 出土良渚玉琮形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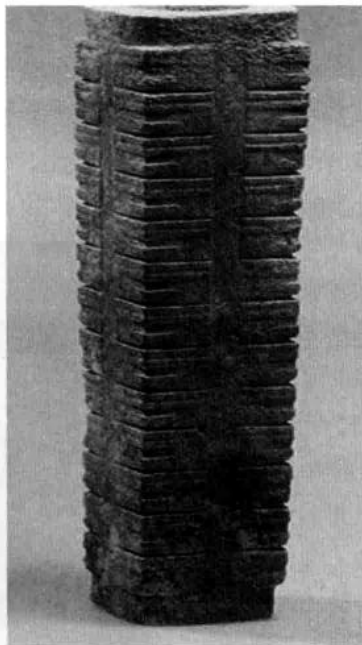


图 1-2：江苏武进寺墩 M3 出土良渚多节高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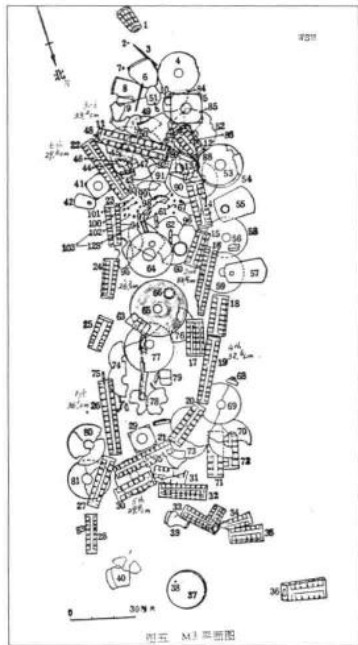


图 1-3：江苏武进寺墩 M3 出土玉器位置示意图

- [8] 宋建：《嵩山地区与太湖地区文明进程的比较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1992年，页360-367。
- [9] 杨美莉：《馆藏黄河上、中游玉琮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8卷1期，2000年，页13-66。杨氏收集资料虽多，可惜没有正面讨论良渚玉琮于江浙地区消失后，什么情况下又普遍在别处出现。
- [10] 刘云辉：《西周玉琮特征与功能考察》，《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1996年，页283-290。
- [11] 《文物》1984年2期，页84-87；《考古与文物》1995年1期，页23-29。报告中的23件玉器皆当地农民在1965-1967年于山坡上采集所得；随后又加5件。
- [12] 见杨建芳（同注7）、杨美莉（同注9），两者都以它为当地制作品。

这一时期，除了在良渚文化墓中常见外，玉琮在其他地域鲜为人知，因而是最能代表良渚文化时代内涵的玉器。公元前2000年前后，玉琮在良渚文化突然销声匿迹时（虽然有沿海向东南伸延的情况），^[8]反而在遥远的黄河流域中上游，即现甘肃、陕西、山西三省西北地带出现，轨迹遍布至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其有出自墓葬的，亦有出于祭祀遗址的，似与先前在东南地区的随葬功能有着不同的含义。杨美莉2000年的文章已详尽罗列出在西北甘陕地带齐家文化范围内出土的玉琮，在此不再一一复述。^[9]

玉琮既是史前中国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玉器，但其在良渚本土的意义，和其在后世的用途、传承、内涵的变化，以及后人怎样理解其含义而促使他们保存这种古物的目的，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思考。刘云辉的综合研究指出，“琮”一名及其礼天的功能是其消失一千多年后周人所述；现代学者更附会不同的解释，如玉琮象征男根或女阴、或是宗庙祖先神灵依附的“主”、或是巫师通天的法器等等。^[10]但玉琮最初在无文字记录的良渚文化本土的意义，现今已无从稽考了。

本文的参考数据虽以墓葬出土品的为主，但考虑到玉琮在其良渚故乡既是饰物、又是礼器的双重功能，出土于祭祀环境的玉琮亦会收入研究范围内。然而，探索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疑问却比可得到的结论更多，藉此会议良机，分享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发现，希望能抛砖引玉，集思广益。

在众多出土例子中，必须指出的是至今所知能归于第一类，即后世保存前代的古玉琮非常少，可举最早的例子是陕西延安芦山峁齐家文化遗址（公元前2100-前1900年）采集的一件人兽纹“琮”形镯（图2-1）。^[11]芦山峁玉琮宽7厘米×高4.4厘米，上阔下窄，是标准“琮”形玉镯形制，方角微凸、琢出二节人（或人兽组合）纹，但因日久抚摸而令其纹饰模糊不清。加上其经裂开成四段后而钻孔复合的状况，清楚表明其在芦山峁齐家文化环境下入土时已是“古董”，而非陕北当时文化的仿制品。^[12]芦山峁同时采集的另一件二节玉琮属于第三类，即当地制作、仿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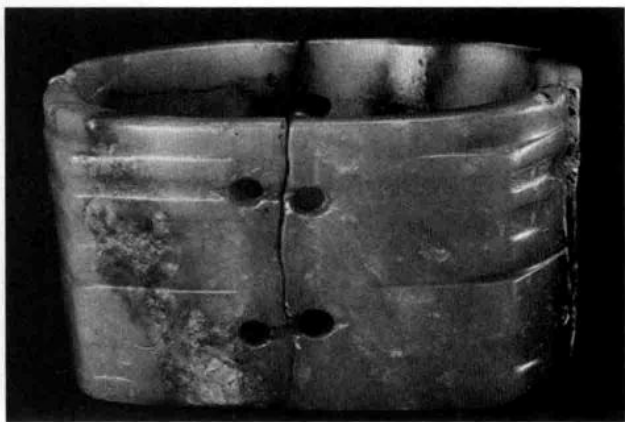


图2-1：陕西延安芦山峁齐家文化遗址良渚人兽纹古玉“琮”形镯

[13]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六）》，《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11卷10期，页74-75、图144。哈佛大学美术馆 Winthrop 收藏亦有同样例子 (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at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no. 238.)

[14] 《考古与文物》2002年1期，页3-11。杨伯达《晚石文博》，1997年1期，页10-18。有较详细描述神木出土玉器的情况，见张长寿：《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邓聪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4年，页59-64。其他出土数据见杨美莉，见同注9。

[15] 《考古》1980年1期，页18-31；1983年1期，页30-42；M22报告见《考古》2003年9期，页3-6。专题讨论见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邓聪编：注5，1，页192-200。

[16] 山西芮城清凉寺（M52）庙底沟二期墓葬中都见一件穿戴在手腕上的玉琮（《文物》2006年3期，页6-7）。



图2-3：陕西神木石峁齐家文化遗址良渚多节古玉琮片饰（线图）

渚形的玉琮（图2-2）。因对典型的良渚人兽纹理解有误，两节都琢成兽纹，并将其倒置，两者在良渚玉琮纹饰上都不曾见过。还有属第二类的古为今用例子，采集于同文化范围内（陕西神木石峁）的薄片状、高20厘米、取自完整多节玉琮、加上小孔，改作佩戴而用（图2-3）。^[13]

以上三种古玉琮虽然都是采集而得，但有鉴于2007年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玉器（以大形玉刀为主）发现在祭祀坑内，和甘肃靖宁数件玉琮都是当地农民于取土时从大石块为盖的土坑中掘出的例子，神木石峁和延安芦山岭收集的玉琮极有可能同样出自祭祀遗址土坑内。^[14]这三种古玉琮的同时存在，显示出甘陕齐家文化曾经直接接触过良渚玉琮原物，因而提供了产生仿古玉器的机缘；同时更暗示当地文化认识良渚玉琮原物时，应在公元前三千纪年中或后半时段，即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式微的时刻。甘陕齐家文化开始仿制玉琮，并应用于祭祀环境中，应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年晚期前后。随后，齐家文化遗址出现的玉琮多以素面为主，偶有简陋的横线或分角纹饰，显然是良渚玉琮分节人兽纹在那里经过长时间演绎后的模糊结果。

经科学发掘墓葬出土的玉琮，较多来自山西陶寺墓地（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15]出土有套在腕臂上的（M1267），^[16]显然与良渚“琮”形镯功能相似；但亦有出自墓中其他位置的。陶寺墓葬出土的玉琮只有第三类情况——即当地新制——或素面、或只刻几道直纹（图3），暗示了陶寺的居民与他们



图2-2：陕西延安芦山岭齐家文化遗址仿良渚玉琮



图3：山西陶寺M3168墓出土玉琮

[1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编：《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页141，彩版39:1-2；图版53:1-2；页142，图73:1-2。

[18] 《殷墟妇好墓》，同注5，页115-116，图版81-83。其中一件残缺严重，不在讨论之列。

[19] 同注18。图版81：2可能是齐家文化古董；图版81：3材质与轮廓和四川出土玉/石琮接近。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多时代、多源化及多用途还未有学人全面深入的探索，却是非常重要和值得专注研究的课题。

大概同时的甘陕齐家文化居民一样，对分节的良渚玉琮只保存了几分依稀印象，其实际纹饰内容已不得而知。然而，在该墓地已发掘的1309个墓葬中，仅13座墓出有玉琮，并且只一墓一琮。即陪葬玉琮的墓，仅占全墓地之1%，与其他玉器（约100件玉/石钺和80件玉璧）的出土数量相比，可见玉琮极其稀有珍贵，属特殊身份阶层人士才可拥有的陪葬品。在山西陶寺遗址以外的甘陕地区所见之玉琮，或无明确出土环境，或出自祭祀坑中，暗示远离故乡的良渚玉琮，除在山西境内还保留着其最原始的腕饰功能外，延伸至甘陕地区后，似多只体现其在良渚文化的宗教礼仪功能，无论是矮短素面的、或是多节高的玉琮，皆与祭祀活动遗址有关。

进入青铜器时代，最耐人寻味的是玉琮在其发源地依然不见。暂时只可举出江西新淦大洋洲墓出土的两件琮形玉器，只占该墓750多件玉器中之0.26%，只有山西陶寺墓葬出土的四分之一。两件玉琮直径（7.7-8.4厘米）比一般良渚“琮”形镯略大，以两节蝉纹或C型旋涡纹代替四角的人兽纹，大小及纹饰都与良渚形有出入，却与商安阳妇好墓出土例子较接近，可能是当时来自中原而非当地玉匠的制品（图4-1、4-2）。^[17]



图4-1、4-2：江西新淦大洋洲墓出土蝉纹和涡纹玉琮

最能代表商人对玉琮的认识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十九件，这是暂时所知一墓出土最多的案例，玉琮均在棺内或潜水面下，具体位置不明。^[18] 其中只有八件接近良渚玉琮的形态和大小，包括两件矮短素面玉琮，或可能是齐家文化的器物。^[19] 十一件为商代制品，其中六件加入时下流行的蝉纹、旋涡纹或其他几

[20] 同注 18。图版 82: 1-3, 83: 1-3。

[21] 同注 18。图版 81: 1, 82: 4。

[22] 花园庄 M54 报告见《考古》2004 年 1 期, 页 7-19; 玉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安阳殷墟出土玉器》,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图版 1。前掌大标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滕州前掌大墓地》, 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彩版 53:4, 页 380, 图 278:8。

[2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 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彩版 18, 图版 231, 页 81, 图 421; 更早出土的见《文物》, 1979 年 3 期, 页 31, 图 1。二号坑未见玉琮。

[2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玉器》,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图版 41。

何纹饰(图 5-1、5-2);^[20] 余五件或细小如玉管, 或高窄如筒, 都与典型玉琮大小有异(图 5-3)。^[21] 妇好墓的十九件玉琮/变形琮式玉器, 指出在晚商统治阶级的意识下, 琮形玉器已有较明显的变化, 除保留着其内圆外方的形态和臂饰功能外, 亦演绎出其他新兴的装饰性功能。然而, 墓中 750 多件陪葬玉中,



图 5-1、5-2: 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蝉纹和涡纹玉琮



图 5-3: 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琮形玉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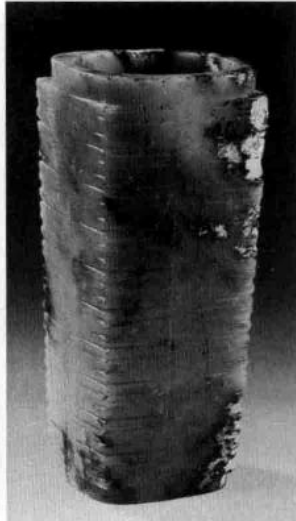


图 6: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采集古良渚刻符号多节高玉琮

琮形玉器依然占极少数(不到 2%), 这个比例继续凸显琮形玉器在商统治者眼中的特殊性。其他商墓大多数一墓只出一件古朴形的素面玉琮(或是古物), 如安阳花园庄 M54 (210 余件玉器之一)、山东滕州前掌大周初 BM3 (360 多件玉器之一) 等,^[22] 表明玉琮在黄河流域墓葬中继续保持罕有性, 及其功能形式上与前代一脉相承的特点。

相对地, 在同时期的四川成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 玉琮一般都出现于祭祀环境内。三星堆的一件琮是以当地大理石制作, 经火烧后放在一号祭祀坑的青铜人头内, 是同坑出土 129 件玉/石器中的唯一一件琮形器。^[23] 金沙遗址发现较多, 暂计有 26 件, 其中仅一件十节、带符号、浅青色的玉琮是良渚古物(图 6)。^[24] 其余都是当时以当地特有的多

- [25] 《文物》2004年4期, 页42-43, 图113-116; 页46-48, 图135; 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 页66-70; 同注24, 图版42-46。[26] 见笔者文章, 同注6; 和 Jenny F. So: "Jade and Stone at Sanxingdui." Robert Bagley ed.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3-75. 此互动关系在青铜兵器上都出现, 见代丽祺:《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研究》, 香港人中文大学, 2011年艺术系哲学博士论文。
- [27] 诸多不同出自白周境内的玉琮例子见刘云辉, 同注10。
- [28] 刘云辉, 同注10 图版264-266。
- [29] 其实, 琮璧的成套出现不只此例, 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已有相似的组合, 如甘肃天水师赵村 M8 二次葬坑中仅有的陪葬品是一琮一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师赵村与西山坪》,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页173, 图139; 彩版4: 1-3); 又见于山西芮城(山西省博物馆编:《河山之精英》, 1997展览场刊, 页2)和传世收藏中(见杨美莉, 同注9, 图17)。虽然这几组琮璧的物料不一定相同, 但其配套的意识应可相比的。
- [30] 玉琮璧铭文讨论可见商志祚, 同注1, 页33-38, 40-42, 图42.8。

层构造的玉/石料制作, 或素面无纹, 或简单划分数节, 而且均比一般良渚玉琮巨大, 更不具良渚玉琮特有上阔下窄的外形(图7-1、7-2)。^[25] 这些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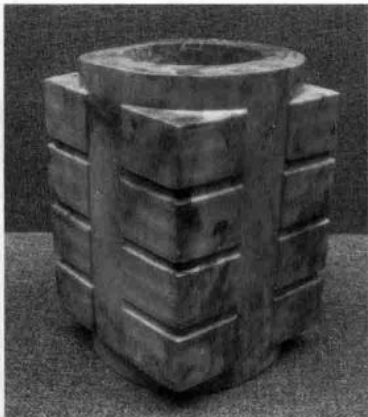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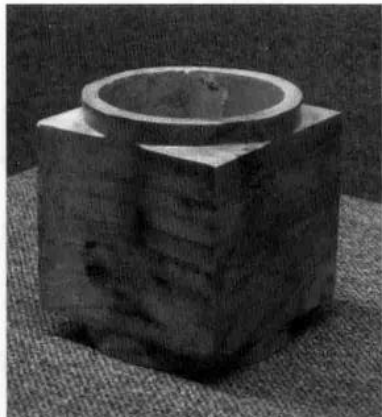


图7-1、7-2: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采集玉/石大琮



图8: 陕西扶风周原祭祀坑出土成套琮璧

不论材质、大小、重量还是外形比例, 显然都背离良渚玉琮的腕饰功能, 只可作祭祀礼器使用。金沙出土当地制作的玉琮, 似从黄河中上游文化玉琮变化而来, 如其对同文化的玉叉形器(或普遍称“璋”)一般, 将它们放大。这种演变再次暗示四川与甘陕一带在史前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却似与同遗址发现的良渚玉琮无关。^[26]

周人原居于甘陕渭河流域一带, 这里曾是齐家文化的活动中心, 他们对琮的偏重是理所当然的。周统治者不但延续前人对玉琮的重视和珍存,^[27] 还建立新制, 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对琮的认识。其中最突出的新现象, 是琮与璧的成套组合使用。1974年在陕西扶风周原祭祀遗址灰坑中出土一琮一璧, 明显是同一时候、有意识地用同一块浅灰白玉/石料制作而成(图8)。^[28] 这两件玉器同时制作, 又同时出现在同一祭祀坑内, 绝不是偶然的, 势必与当时某祭祀仪式有关。^[29] 或可考虑到晚商时已有同类组合出现, 但被埋葬在公元前8至前7世纪虢国国君(虢仲)三门峡M2009墓中。^[30] M2009出土“小臣兹”玉琮的大小(宽5.1厘米×高12厘米), 射与身的高度比例与妇好墓最高的玉琮形器(宽4.9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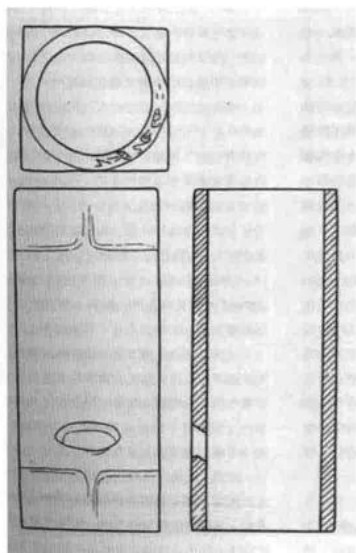


图9: 河南三门峡M2009虢仲墓出土“小臣兹”琮形玉筒(线图)

[31] 《文物》1994年1期，页11-26，图36。简报提到M91都有玉琮在墓主两腿之间。因或没有图片，或发表图片模糊不清，不能分辨出玉琮是古物或是当时仿造。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编：《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彩版38：1，图版131：1，页354，图248：1。虢国国君M2009墓暂未见考古报告，但据发掘者口述，此墓共出八件玉琮（见杨美莉，同注9，页40，注88），因而不排除同样用玉琮为性器罩的可能性。



图10-1：山西天马—曲村M8晋侯墓出土/仿(?)良渚玉琮形生殖器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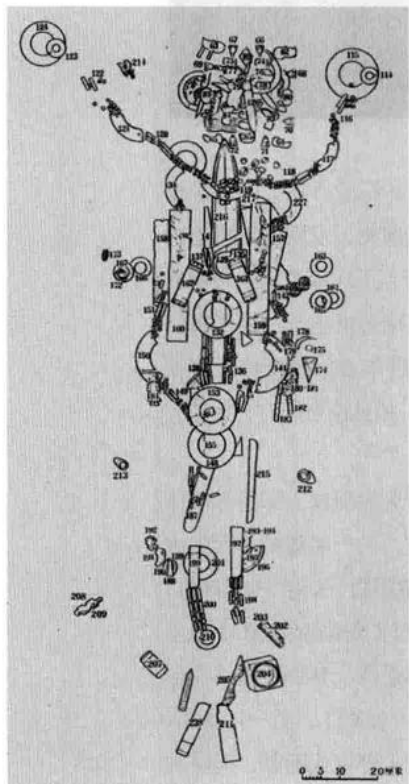


图10-2：山西天马—曲村M8晋侯墓出土玉器位置示意

米×高10.4厘米)颇接近(见图5-3,图9),虽素面无纹,仍可辅证其为商代古物流传几百年后至虢仲时代的假设。同墓出土的“小臣兹”玉璧(亦有称“瑗”),刻铭位置同在圈口缘上、字体一致、应是同时代的玉铭刻风格,但琮和璧的铭文内容不大相同:琮铭的“小臣兹”是志其拜见商王后得到赏赐的盛事;璧铭的“小臣兹”是祈他死后莫加害于商王而得后人所祭祀。因此这套琮璧的配合使用,极可能发生在两件器物制作及刻铭之后,即西周初到虢仲墓时代之间,暂不能当作商代的组合。

陕西扶风出土玉琮的孔径正好与玉璧的孔径套合,并可转动;这现象是否巧合还未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琮璧作为祭祀礼器的有意识组合至迟始于周初,又能反映出远古齐家文化传统在周人故乡的潜在影响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战国晚期之《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琮璧的组合认识——“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是当时人对周初祭祀活动不甚详尽的理解。这些认识或可追溯周原文化为根源,但绝不能应用在远古的良渚文化范围里。同样地,学界对良渚琮璧的涵义和功能的认识,亦只能以周人的理解为本,不宜附会于远古良渚人的身上。

周人对玉琮的演绎不止于琮璧在祭祀仪式上的配合,还在墓葬中给予新的功能。以厚玉殓尸是西周中晚期墓葬制度的重要新发展。山西天马—曲村M8晋侯墓(图10-1、10-2)^[31]和河南三门峡M2011虢国太子墓中,^[32]男性墓主人都用玉琮来保护他们的生殖